

走向 21 世纪的菲律宾社会科学

〔菲律宾〕 林 晓 彤

· 本文通过对菲律宾社会科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全面地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既要彻底摆脱具有殖民、军事征服与传教者的思想方法特征的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对菲律宾社会科学的影响,又要对当代流行于世界的以“美国化”“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思想理论进行必要的扬弃。亚洲国家或其他被称为“低发展”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亦应适应于服务于各自的现代化事业。中国文明及华夏世界是亚洲文明的重要方面之一,应该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

作者:林晓彤(Aurora Roxas Lim),女,菲律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菲律宾不久即将庆祝 1896 年之大革命及 1898 年第一共和国建立百周年。庆祝活动种类繁多。诸如:修建史迹碑志、召开会议、发行纪念邮票、举行公众历史知识竞赛、民族文化的展览、表演等等。此外,各种学术机构则专注于研究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历史,以求这个关键时期的菲国历史真象更为清晰,菲律宾大学即为其中之一。

研究的目的是重新探讨复杂的史实,社会剧变的根源和领导阶层内部为害甚深之冲突的原因。刚建立的共和国根基尚浅,因上述的剧变与冲突,受祸极深。在研究过程当中,菲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种种难题,像观点的不同,立场的矛盾等。由于大多数的历史文献皆出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人之手,而研究的结果对今天的各利益及权力集团也有切身的影晌,所以对于文献记载应给予怎样的评价?该使用何种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又如,在研究菲律宾大革命这个敏感的主题时,研究者是否能完全客观而超然?在此背景之前,我们颇有必要简述菲国研究社会科学的历史。

一、探讨菲国内外范畴较广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才能较好地理解菲律宾的社会科学研究

在过去的菲律宾,社会科学之作为一种学术项目,并未逃脱其为殖民地当局政策的附属品之命运。当时设立的教育机构都以教育人服从殖民政权,为殖民政权的文化与经济利益服务,为首要之目的。科技、教育及政府制度,都促使菲律宾的文化及经济直接和西方世界挂钩。不该忘记,长期以来菲律宾人民为此付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及心理各方面沉重的代价。我虽然不想把过失完全归咎于西方殖民强权,因为受治于人者也该负一定的责任,可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后遗恶果,和它对菲律宾社会科学的不良影响,也该加以讨论。这一点是重要的。

自1908年菲律宾大学创立,直到1945年菲国独立之后,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两院的教授都是美国人和受美国教育的菲律宾人。这两院醒目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学院与人类学院的分别独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较复杂、已高度发展、更适应外来文化的社会。而人类学则专事研究“部落的”、“原始的”、“文字创作之前的”、“非基督徒的与异教的”等等主题。两院分立很可能是为分工着想;也许因为两种学科内涵庞大,为了提高教学与行政的效率,故而如此决定。不过,分立的原因也可能是当时美国人愿将研究印第安人的项目归入人类学院,而该院事务正是由美国内政部印第安科管辖。由此可见,美国在非所建大学院系的体制,不仅影响到学校的行政,更进一步而影响到菲律宾人对本国的社会、人民及其他种种的认识方式。在学科分立的行政体制上,即含蓄地将菲律宾人民分划成全然不同的两部分。住于平原、信仰基督宗教、并已西化的菲律宾人属于“多层次的进步社会”,其中大多数人都通晓西班牙语或英语;而居住在山区、偏僻丛林或远离马尼拉各岛屿的人则属于“非基督徒的、落后的部落”。有过一个很长的时期,菲律宾的人口统计和图书馆的分类系统是根据宗教信仰而区分人口与地区的。宗教信仰一项竟然比入息、职业、文化水平、健康情况及其他社会性资料更为重要,岂非怪事。

殖民式的、军事征服式的、传教士式的思想态度对学术的研究有很深的影响。我们的历史是以“信仰基督宗教之前”和“信仰基督宗教之后”来分期的。“信仰基督宗教之前”的时代一般认为是蒙昧黑暗的时代,而“信仰基督宗教之后的时代”则是历史前进的转折点。对从16世纪到19世纪菲律宾历史的进展,也理解为一种“基督教文明化”“西班牙化”的过程。研究菲律宾的社会与文化,也是以其是否符合“基督教文明”的教化,是否已脱离“异教的生活方式”为准则的。重视强加的外来价值自然不能不损及本土的固有文化。因此,所谓的“土著”被形容为“落后的”“迟钝的”,只好接受另一种生气蓬勃高瞻远瞩的文明。外来的因素似乎理所当然地,依照殖民者的目标,负起了改造“土著”人民及其文化的任务。基督教未传及的地区便称作“异教的”、“非基督徒的”地区。最糟的是西班牙人按照他们在本国及北非的习惯,也用带有侮辱意味的名词“摩洛人”来称呼菲岛的穆斯林族。西班牙武力殖民者对西班牙本土的穆斯林族即怀有偏见与不满,故而遇到菲岛的穆斯林族,双方的关系在开始之前即已夭折。对菲律宾社会学者同样有害的思想态度,就是将人群依种族区分高下的等级:西班牙人美国人及其他西方人归入最高等,本地人民则概称为“野蛮部落”或“印第安人”。在历次菲岛武装革命时期,凡西班牙人美国人所报导的菲岛情况,皆称菲律宾的各革命领袖为“强悍的部落酋长”,企图吞并其他“部落”。由于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反亚洲人、反非洲人及其他各地人的成见,在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执政者在内的菲律宾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极难拔除。成见之深,可从当年从西班牙及美国手中接来的反亚洲人移民条例里看到。这个移民法直到1972年方才废除。

自30年代起,“西班牙化”转变为“美国化”,自50年代至今又称为“现代化”。1941年至1945年,日本在占领菲律宾期间曾高唱“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之口号,但是日本皇军的累累暴行反而更加促进了“美国化”。在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人的声望在菲律宾人心目中崇高无比。当时所谓的“现代化”即等于“美国化”或“西方化”,也等于是所谓的“进步”。不言而喻,菲律宾人、亚洲各国人和其余人类,都成为“落后、迟钝、过时、古旧、贫穷”的了。

惟有美国才代表进步的这种观念,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因冷战而变本加厉。当时一般人的视野甚为简单,宇宙的中心就是美国,代表一切的善与有益于人的价值:“自由”、“民主”、“繁荣”、“进步”以及“合乎常规的价值”。在另一方面则是共产主义,代表“极权”、“独裁”、“压迫”与“贫穷”。美国对“铁幕”及“竹幕”的封锁极其成功,当时我们所得到的有关中国的

消息,例经渲染、歪曲,或根本就是谎言。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之初,为了减轻美国在亚、非、拉丁美洲各同盟国所受的恶名,像“落后的”“香蕉共和国”等一类名词都改为“传统的”、“低发展的”、“发展中的”国家。不过,发展的轨道依然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式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态度不幸在90年代仍可见到。

因此,西班牙及美国殖民时期的思维方式、分类策略、宗教、种族、政治的成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在过去和现在,都影响了某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教学和研究的途径。某些社会科学的设想及方法,比如说,“科学的客观与超然”的论调,至今仍有其影响力。作为科学的客观与超然的必然结果,便是社会科学采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运用数学及统计学的全套复杂的定量分析。如有人表示愿致力于研究某一人群如何能自拔于贫穷和无知,以及可能遭遇何种阻碍等,即被视为“不科学的”,或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在1976—1977年,菲中两国恢复邦交之前,上述态度导致根本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态度也形成了当时菲律宾社会科学研究上的人为分裂。一方面是“学院及学者式”的社会科学,为人看做是“正统的”;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实用的”社会科学。在60年代中期,“实用的”或“应用的”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分支衍派,成为社会工作、社区发展、农村社会学、农业服务,或统称为“变革的推动派”,其任务就是遵照“民主的目标”引进社会变革。由此而又诞生了各种著名的发展方案,诸如“绿色革命”、“涓滴到底的经济”等等。

反常的强调“理论性的”、“纯学术性的态度”,造成社会科学及人类学两学院之脱离实际。当时的研究重心置于以众多的定量数据为基础,从而建立理论及分析的模式。同时又尽一切力量研究美国及西欧所形成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各种理论。由于紧追美国学术界的发展,故而美国流行的一切名词,像“语义清淡”、“象征体系”、“女权主义”、“性别敏感”、“同性恋解放”、“人权”、“民主化”等等,都在菲律宾立即引起反响。在人类学方面,由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研究工作是依据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逻辑实证主义——施行于说明的以及分类的人种学。当时一般人相信,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般,最后会找出社会及社会运作程序的一套颠扑不破的数学定律。

上述“实用的”和“理论的”两派社会科学之间的深渊,可想而知最后走进了死胡同。但依然没能使人对本学科进行重新评价,或是与主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团体从事对话,反而引起了一切学术和菲律宾社会的两极分化。在70年代,当越南战争如火如荼,菲律宾的军法统治变本加厉,愈来愈多的人,尤其在美国和西欧,都反对美国之干预越战,菲律宾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也起而向美国所栽培的菲国政治体制发出挑战。众多的青年与工人合作,组织了抗议运动和小组讨论。其中不满当时大学教育的人成立了自己的研究组织与民众组织。英文简称之为NGO和PO,意即“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组织”。一些大学教师和学生参加了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新人民军,目的在于推翻当时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在他们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另一个社会与政治的发展模式。

1986年,对军法统治广泛的反抗终于爆发为众所周知的“EDSA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包括了菲律宾社会的各阶层,尤其是天主教会、工商企业界以及武装部队中的不满军人,群众聚集于首都区的诸圣显现大道(简称EDSA)的军营门前,公开要求军统政府下台。马科斯总统被逐流亡美国。其后,大多数政治犯获得释放,政府领袖换人,然而不幸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以及相随的思想方式却几乎毫无改变。期望于阿基诺政府之能容纳更为激进的政治社会

组织共享权力并未实现。反而,政治领袖、军方以及社会科学机构等似乎难于采取军统时期从斗争中得来的教训,来适应当前的各种建制与程序。1987年制定的宪法虽然废除了以共产主义为非法的条款,可是冷战心态的残迹,在军队警察和其他政府机构之中仍未消失。

1989年苏联解体,两大超强相峙不下的紧张局势松缓之后,双方的各个卫星国便乘机解脱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在另一方面,苏联力量的消失引起了前苏联境内及东欧国家中激烈的种族对立,而且亚洲各地,阿富汗、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地的武装冲突,使我们不禁要思索,人间冲突的根源究竟何在,是什么原因使本住于同一地方的人群竟然满怀仇恨走上极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治安情况恶化,数以百万计的菲律宾人宁愿选择在外国并不稳定的生活,也不肯留在家乡谋生。目前大约有25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其中大部还是年轻的母亲或未婚的女性。其对家庭生活的不良后果,对年幼者之失去家庭的照顾,对我国前途的影响,不言而喻。冷战时期发生在菲律宾学术界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今天看来,确实毫无意义,我们是跟错误的“敌人”打了仗,就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或该更谦虚地说,社会研究工作应该负起共同的责任,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

二、走向21世纪之际,研究社会科学 科学的另一个途径该是什么

首先,社会科学应为当地社会的最高利益与福祉服务。医生职在医疗身体的疾病,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工作者有责任“为人民服务”。这句话首倡于中国。自50年代以来鼓舞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我希望这句话所代表的理想并没有被当前的口号“致富光荣”所完全冲没。以下所谈的,是由菲律宾本身的历史及文化经验总结而得的初步建议。不必说,这些都是地方性的计划,主要目标是我的菲国同胞,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别人是无法铲除我们的社会弊病的。

如果我们愿为最大多数本国公民的最高利益服务,便不应该拿一个外来的发展模式一律强加给每一个人,而不问他是谁,或他住在哪里。西方的新闻媒介所说的“进步”以及大多宏观经济发展计划的假定,都指的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和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一模一样。这个目标实际上有彻底修改的必要。因为人群都是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各不相同。像热带小珊瑚岛上的居民,或是住在高山深谷里的人,或在沼泽红木丛中居住的人,或是内海船艇上的居民,他们绝不可能像美国的中产阶级,消耗掉那么多种类、那么庞大数量的物品。他们居住的地点,他们对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形成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并非说,我们完全不理解这些人群,让他们停滞于自古相传的居住地点和文化,无从受益于现代的医药和全球的信息通讯。恰恰由于我们掌握了科技,能找到他们,记录他们的社会及文化生活,我们才能调整宏观经济计划,谋求他们的最高利益与福利,适应他们的环境。以前社会科学的缺点之一,就是假定所有的人都该步伐一致地走向“进步”的终极目标。这种“进步”暗含的观念其实是一种自诩为“世界级公民”的狂傲心理,以能大喝可口可乐大吃麦当劳牛肉饼为理想。西方控制的新闻媒介和一些受过社会心理学训练的人,专好为这种“进步”大事吹嘘。

社会研究工作必须要提醒政府的决策人和全国公民理解到,国内种族及文化群体的复杂性、多样性及敏感性以及优裕的生活并非只有一种。优裕的生活并不需要追随流行歌星的生活方式,不必穿他们那种惹眼的服装,不必学他们的恋爱方式。或如纽约大企业的顶尖人物,享受豪华而不对客户直接负责;或如高级将领,派遣男女青年到根本不该干预的国家去送死,他们

过的可是优裕的生活?所以,种族、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该视为达到国家发展目标的障碍,而是决策人设法使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之间取得平衡的考验,他们该设计出层次不同的方案,以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在传统的菲律宾社会里,人群一般是以往在何地,如何谋生等项目来区分的,如冲积平原的居民(Tagalog)、海上居民(Tausug)、山地居民(Tingian)或生产椰酒的人(Tuba)等。由于居住环境的不同,谋生方式的不同,才出现了以物易物的贸易以及物产、服务、观念、人口等的交流。从前西班牙传教士曾以宗教信仰和政治归属或西化的程度来区分菲律宾人口,而亚洲人的社会研究工作就该设计出更适合特殊社区、特殊人群的分类项目。项目和区分原则可根据某一社区的特征来制定,比如:当地的语言、谋生策略、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等等。利用这些数据与资料,可进行比较研究与归纳普遍的原则。从自然生态学及自然环境研究借来的“自然生态体系”及“持久的发展”等概念,是非常有用的思想工具,借以除去把“已发展”和“低发展”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我们能进行地域与文化的单位研究,甚至可细分为滨海社区、沿河社区等,研究人群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此外,滨海人群、沿河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河流上游及高地居住的人群相互影响,甚至层层扩大,远及于首都与各国首都等不同地域。首都制定的政策又复影响滨海社区,故而我们也需要研究其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我们并不支离片断地研究文化与社区的面貌,如只考察家庭结构、经济活动、礼法祭典等,而是将上述各项与全社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整体地加以思考。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以便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去理解人群。也就是说,社会研究的工作将由许多不同的专家参加,借助于多种学科互相合作的方式,各自贡献专长,共同努力。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训练各社区当地人士,进行目前所说的“参与性研究”。从事社会研究的人有责任训练所研究的社区的当地人,让他们自己进行研究,培养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自己筹划发展目标的能力。

当然,社会研究工作不要只局限于研究农村或城镇小社区,也要会处理更广大的社区和更重大的问题,像南海地区或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等等。长期以来,我们常听说,这些大问题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关系,只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巨头会议或军工财集团才能操纵“全球”经济。可是,这些能决定在“世界市场”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货物值多少钱的人究竟是谁呢?人是否有办法建立一种财政制度,使石油产业的庞大收入转注于有关的各种工业,转注于研究与发展的计划,好为石油用竭之后的日子做准备呢?我们是否能找到其他种的能源?矿物燃料既然制造严重的污染,太阳能电池为什么未能尽快发展呢?所以,我们该对(西方所说的)“全球”一词有所怀疑,它所指的可能只对富强的大国有益,而对像我们一般的小国却有损无益。我们也听说过,这类题目应由先进且已发达的各国智囊团去研究。然而我却认为,亚洲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现在即应通力合作,解决像和平、安全、同胞与文化的生存等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否则,别人就要插手了。

另一个我们应该研究的高层次主题,就是《中国文明及华夏世界》(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Sinic World)。这个总名称包含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和各受中国影响的国家之间文化传授与相互影响的复杂发展。在菲律宾历史及东南亚历史上,中国一向承担了关键而必不可少的角色。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是菲律宾历史与文化重要的一面。国际间多种学科参与的“丝路”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前例,表示我们已脱离了意识形态的二分壁垒,许多的人、地、利益联合起来,以崭新而又令人兴奋的方式,共同研究人类史上极复杂极有动力的主题。印度、阿拉伯—波斯、伊斯兰及东南亚等地文明也可用类似的方式研究,这些文明自会给全亚洲及全世界贡献丰富的思想和技术。在陶瓷、丝绸、漆器、文学、治国方法、国际关系或是优裕生活的方式等

种种方面,上述各地文明都曾有辉煌的成就。

最后,亚洲的社会研究工作一定要推广亚洲文明的价值及其过去与现代的成就。亚洲社会研究绝不可重蹈过去的错误,将缺少伦理道德的价值观说成是“客观、科学性的超然”。我认为文化与风土地域纵然有其特殊性,但持久而普遍的价值必然是存在的。我们需要的是慎思明辨和实际工作上的精微练达。当前,美国对那些向它的经济利益挑战的国家,有选择性的指责其“侵犯人权”,这种手法是不公平,并且断然是不相宜的。同样之令人反感,还有日本 SONY 企业董事长 Akio Morita 所说的由于“美国人的种族偏见”和日本人的“奴隶心态”才使日本的电子工业超过了美国。他忽略了,种族偏见并非是美国人所独有的,而是人类的通病,是该以相宜的教育予以彻底铲除的。似乎 Morita 先生自己不知道,日本的警察不时地骚扰住在当地的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原因无他,只因为他们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克林顿先生和 Morita 先生当然不能自称是在研究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该以书写讨论的方式质问这类没有根据不负责任的名人谈话,就因为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名人。

亚洲的各大宗教,从印度教到佛教、耆那教、道教、儒家思想、基督教和泛灵教,都有宇宙一体、秩序井然,一切受造之物与之和谐相处的共同认识。像慈悲、民胞物与、谦逊、允执厥中、勤奋、自律、家庭生活与大我的高超价值、个人品德的修养、宽容、坦诚、善意待人、好学敏求等等的美德,都是亚洲固有的珍贵传统,应该仔细的研究而为全亚洲人所共享。我们有能力保存并且发扬亚洲最好的理想与价值,对这一点,我们是非常乐观的。传播的技术已经存在,虽然目前仍为美国和日本所控制,许多亚洲国家已急起直追,取得科技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大家可以看到,前景光明。偏远的社区,能依照本身的需要和喜好,不受跨国企业的控制,得与全球的通讯系统接触,以便知道,比如说,莫洛路亚和方加陶法岛上的渔民,在法国的“核试”之后,何时才能安全回家。或在巴登邦省,何时收获成熟的桔柚,才不致踏上地雷。越战中洒下的脱叶毒素,因之而受害的儿童如何才能痊愈。社会科学面临的考验可谓比比皆是。对于有才干、有技能、而又肯干大事的人说来,前途确有大好机会。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亚洲人全体一致的政治意愿而已。

19 世纪,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曾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党人合作,愿准确地界定他们为之奋斗的将是怎样的一个新国家,他们期望有一个真正独立、具有主权、和平而繁荣的国家。他们期望全亚洲人都得到平等而合乎尊严的待遇。但百年之后的今天,不同于其他亚洲人的是,许多菲律宾人仍未达到这个目标。我希望我国的社会研究能实现这个目标。日本的 Kinichi Ohmae 先生倡导说:“到 21 世纪,工业和信息将实现全球化,民族国家形将落伍。日本的一些工程专家也预测将出现“高效机器”来代替政府和民族国家。不过,对我们菲律宾人说来,我们则要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一个民族群体,能让我们全国合作,守纪律,能提供动员全民精力与资源的组织与方案,以便我们可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理想。任何跨国企业,任何高效机器,都无法给我们提供历史与文化的基础和心理感情的支持,以鼓舞一个人群融化为一个民族。在我们努力实现菲律宾大革命之目标的路上,我们期望亚洲同侪的鼓励和协助。

责任编辑:王 颖